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Suicide as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美]伊琳娜·帕佩尔诺◆著

杜文娟 彭卫红◆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Suicide as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Dostoevsky's Russia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 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美]伊琳娜·帕佩尔诺 ◆ 著

杜文娟 彭卫红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 (美)帕佩尔诺著;杜文娟,彭卫红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71-3

I. ①陀…

II. ①帕… ②杜… ③彭…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 F.M. (1821~1881)—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62 号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著 者:(美)伊琳娜·帕佩尔诺 译 者:杜文娟 彭卫红

责任编辑:崔文辉 刘 学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7.25 字数:24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71-3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当代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研究之一。作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研究，它并非一部标准的文学批评。书中将文学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即（用隐喻的说法），作为人类自己所纺织的意义网之一部分。从最广义的角度而言，本书研究了文化的不同领域——科学、法律、报刊、文学——如何构成人类体验之意义：其中文学与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中心角色。我选取了一种极端的人类体验形式：自杀。自杀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囊括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对于一个人而言自杀意味着什么？尽管自杀行为普遍存在，自杀的意义却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文化各异，自杀也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谜团——一个呼求解释，但又无法解释的行为。数世纪以来，世界不同地方的思想家们都在著书立说探讨自杀问题，试图解开这一谜团：自杀一直是哲学、宗教、伦理、法律、医学、社会学、报刊，当然，还有文学关注的话题，尽管许多含义是共同的，每种文化和每个时代均加进了自己的解释及其关注点。19 世纪的自杀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自杀；俄国的自杀可能不同于西欧或中国的自杀。

几乎无人像 19 世纪下半叶伟大的俄国作家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如此关注自杀。想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著名的人物：《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加洛夫、《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加科夫、《白痴》中的依波里特、《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小说《少年》几乎充满了自杀流行病。（在该小说早期草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让其几



乎所有的人物都自杀)当然,他笔下也有一位探讨自杀问题的思想家,《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这同样是一位自杀者,他阐述了一整套理论,按照此理论,自我毁灭是他那个年龄的男人最自然,且不可避免的行为——这是现代条件下生活之一部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任记者时的作品《作家日记》为例,该作品在其同时代人中极受欢迎。《作家日记》是一部体裁独特的作品(发表于19世纪70年代),也是一部由一人撰写,公之于众或以月刊形式发表的私人日记:其中包括对作家每月实际体验的各种感想的讨论:所见、所听、所读。自杀描绘了对报纸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收其小说《温顺的女性》的读者来信中所报道事件的详细讨论的印象。自杀——以及犯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核心问题:一个把持人类存在意义之关键的哲学问题。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杀的思考影响了后来几代欧洲思想家,其中有,弗里德里希·尼采、阿尔贝·加缪、路德维希·维根斯坦。加缪的《西叙福斯神话》(法国存在主义的重要宣言,写于1940年)一开篇便有如下陈述:“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评判生命是否值得生存等于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些话被一再重复)加缪在阐述这一对20世纪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问题时的参照点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杀的论述。说加缪这样的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哲学家有意忽视自杀的社会及历史因素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创作时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即俄国19世纪60-70年代,如此的说法似乎并不夸张。有些文学研究者也持此观点,他们撰文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杀是一种文学主题和一种文学手段。然而如果我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自杀的论述重新置于俄国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又会怎样呢?这正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问题。

19世纪6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一个被视为改革与更新(尽管不是革命)的年代。其重要性仅次于彼得大帝开创的文化革命,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运动(类似于彼得大帝改革)依赖于西方思想及现代性的观念。所谓的农奴制改革即解放社会:农奴解放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司法体制(包括法院设立陪审团以及公开的司法程序)、地方政府、军



队、财政、教育，以及报刊的改革。在城镇和乡村，当地政府承担起公共福利的任务：任命医生和司法调解员，收集社会疾病的统计资料（死亡、犯罪、自杀、酗酒、卖淫），设法抵制犯罪与流行病。俄国历史上首次拥有了相对自由的报刊机构。新报刊和公开的司法程序就是所谓的公开性（公开性——是一个源于某个时代的词语）。这些年有为数众多的报纸和杂志问鼎于世，讨论与“俄国西欧化”相关的广泛问题：铁路、银行以及大撑的发展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科学向日常生活扩展的问题；犯罪率增长以及处罚体系改革问题。随着改革——改革未能建立一个稳定自由的社会——而出现俄国政治激进主义的增长（受西欧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伴随着知识分子革命。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一种坚信科学是社会和道德秩序唯一可靠基础的世界观）放肆地向生活的宗教根基——俄国东正教发起了挑战，这是由古老的俄国传统加以巩固并由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根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实证主义世界观紧密联系，以极端的形式反对宗教，支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对于同时代人而言，“社会主义”、“唯物主义”以及“无神论”均为紧密相关的概念：对一些人而言——是社会和知识分子解放的一个约定，对其他人而言则是——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一种威胁。这一知识分子革命在具有各种社会背景的新生的职业知识分子阶层拥有社会基础，这些人均对其社会根基怀有疏离感并且对现存秩序完全持对立，以及敌对的态度。著名的俄国“知识分子”登场了。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自称“新人”。“新人”通过富于战斗性地否定“旧世界”，及其传统、信仰，以及价值，而对他们自身也加以否定。他们的对手们称他们为“虚无主义者”。这些发展均发生于西欧文明的背景之下（并且，19世纪60年代的诸多变化是俄国“西方化”或“现代化”的另一种尝试）：然而，与往常一样，俄国文化呈现一种别样的形态。在俄国的土地上，西方思想、关注点，以及机制被加以不同的解释，被误解，被扭曲：一句话，被盗用。既非“西方”，亦非“东方”，俄国创造了其独特的文化要素。

本书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杀的关注。然而，



自杀问题——以及犯罪——在俄国报刊上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和辩论。在俄国，这尚属新鲜事物：在公开性时代之前，报刊上很少报道自杀事件，也从未讨论过。（相比之下，在英国，自18世纪初起报纸上便广泛报道和讨论自杀事件。）事实上，人们已确信，19世纪60年代俄国便出现了“自杀流行病”。这是否真是一种流行病呢？此问题尚悬而未决。但是有一种情况不容置疑：公众对自杀又产生了普遍的兴趣。记者、律师、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学家，以及作家谈论自杀，提出各种——充满冲突的——解释。我认为，自杀成为了此骚动时代的一个主要象征。

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阅读本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兴趣的读者会在本书中找到对其书中自杀事件之含义的分析（第五、六章的主题）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他作家的影响（第七章）。此外，因为自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奠基石，因此本研究（广义上讲）是对作为艺术家及哲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入研究。我的书也可以被视为论述19世纪俄国自杀现象的文化史。实际上，本书关注的焦点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节日仪式或祷词，而是自杀：自杀的含义及其在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这就是我为何说自杀是一种“文化风俗”。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国”时，我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造他那个时代的理性风尚和道德风尚方面至关重要。

中国读者是否能在本书中看到一個与其以往所读及所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然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呢？俄国19世纪的自杀是否不同于中国的自杀呢？我不知道。但是能致函给一个关心普遍话题的陌生的读者群这是所有作者的最大的荣幸。

伊琳娜·帕佩尔诺

2001年7月，伯克利

原序：自杀的象征含义

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知道何为原因，然而，我们从何处获得我们的这种知识，确切地说，获得我们拥有这种知识的信念的呢？从著名的“内心事实”领域，而迄今这类“事实”中没有一个已经证明是事实，我们相信自己在意志的行为中是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在这一场合当场捕获了因果关系。人们也不怀疑一个行为的 *antecedentia* ^[1]，它的原因，可以在意识中寻找，并且只要去找，就总能找到——作为“动机”，否则就不能自由地作此行为，也不能对之负责。最后，谁会否认一个想法是有原因的，“自我”就是想法的原因？……在第三个似乎作为因果关系的保障的“内心事实”中，第一个且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意志即原因；意识（“精神”）即原因的观念以及更后面的自我（“主体”）即原因的观念纯粹是派生的，是在意志确定因果关系为既定事实、经验之后产生的……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更善于思考了，我们今天不再相信所有这些说法。“内心世界”充满着幻影虚光，意志便是其中之一。意志不再推动什么，所以也不再说明什么——它仅仅伴随着过程，它也不能缺席。所谓“动机”是另一个谬误。它纯属意识的表面现象，行为的伴随物；与其说它体现，不如说它掩盖了一个行为的前项。至于自我，它已经变成了寓言、虚构、文字游戏，它完完全全停止了思考、感觉、愿望！

结论是什么？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的原因！这方面的全部所谓经验都见鬼去了！这就是结论！——而我们业已有教养地滥用了所谓“经

验”，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作为原因世界、意志世界、精神世界的世界。最古老悠久的心理在这里起作用，它别无所为，对它来说，每个事件都是一个行为，每个行为都是一个意志的结果，世界化身为许多行为者，有个行为者（一个“主体”）悄悄潜伏在每个事件背后。人从自身投射出他最坚信不疑的三个“内心事实”，即意志、精神、自我，——他由“自我”概念才得出“存在”（Sein）概念，他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自我即原因的概念来设定“物”的存在。然后他在物之中始终只是重新找到他塞入其中的东西，这有何奇怪呢？——再说一遍，物本身，物的概念，仅是自我即原因的信念的一个反映罢了……甚至连你们的原子，我的机械论者和物理学家先生们，有多少谬误、多少退化的心理尚残存在你们的原子里！——更不必说“物自体”，形而上学家们的 *horrendum pudendum* ^[2] 了！精神即原因的谬误被冒充为实在！被立为实在的尺度！被称为上帝！ ^[3]

问题和方法

在普通大众及科学界的想象中，自杀被揣测为一个不可思议之谜和一种无法解释的行为 ^[4]。20 世纪，心理学家已经急不可待地接受了寻找这个问题答案时的失败结果（然而，他们并未放弃这项事业，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自杀学”） ^[5]。1910 年 4 月维也纳心理分析协会举行了一次关于自杀本质的讨论会，弗洛伊德在他的总结性发言中说：“还是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经验会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6] 1936 年精神病理学家戈利高里·齐尔伯格声称：“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自杀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这点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一般的常识，还是临床的病理学都未发现发生自杀的原因，即使是一个严密的，以经验为根据的答案也未找到。” ^[7] 1973 年美国自杀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埃德温·施奈德曼在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其名为《论自杀》的条目时指出：“没有人真正知道人类为什么自杀。” ^[8]

精神病专家安东·李纳尔斯在开始他对 1988 份自杀者遗书的研究时，也说过相同的话。^[9] 没人真正知道人为什么要自杀，甚至包括自杀者他们自己。

人们最终离去时留下一个“黑洞”，^[10] 自杀创造出一个需要添补的空白。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哲学家、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探寻自杀的意义，有关这个“黑洞”写了许多著述。人们一直将自杀行为与特殊的含义形式联系在一起。某一个人或许从他明确的个人经历中得出自杀的含义，而文化则是趋向于把自杀行为作为重要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加以研究调查的一个实验室，例如灵魂不朽、自由意志、个人与上帝、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关系。当自杀被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行为来理解时，自杀就变成了社会逻辑学和历史学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我将尽力去展示自杀——一种个人行为——是如何变成一种文化现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自杀称之为：“一种文化风俗”：即它是一种与适于一般文化目标和社会特别需要的象征意义形式相联系的活动。我的研究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它与 19 世纪的俄国有关，并且也参照了西欧的相关情况。我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是专门针对 19 世纪的俄国，而另外一些则与西方文化相同。我既不想试图去发现“人类为什么会自杀”，也不想去分析自杀行为、自杀的形式及其发生情况，这部书所要讨论的是人类经验之内涵的文化构成。

本书的结构布局是由所能获得的材料构成的。然而，因为当把人类的行为载入历史记录，使人类的行为变成一种风俗时，这本书必然会反映出，在俄罗斯自杀这一文化风俗的变化结构。在俄罗斯，自杀首先出现于中世纪教会律法中。

18 世纪 90 年代，当歌德笔下维特的感伤主义的狂热崇拜，英雄式自杀的启蒙理念和法国大革命的回声传播到俄国时，自杀已经变成小说中一个非常流行的主题。19 世纪 30 年代，有关自杀的资料首次出现在统计调查和一些重要的报纸报道中。但是仅仅在 19 世纪 60 年代，

即大改革期间，创建了许多新的公共机构（出版机关，对外公开的法院和统计局），自杀已变成在科学、法律、小说及以上所提到的各方面，还有期刊出版物所热烈讨论的对象。在 19 世纪 60—80 年代期间，人们确信俄罗斯经历了一场“自杀流行病”，这场流行病留下了许多记录。在俄国社会处于根本性变革的时期，恰巧同时发生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证主义抬头——这一变革时代创造了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即自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获得了一系列意义，并且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1905 年革命之后，自杀再次成为当时社会状态的象征。1906—1914 年间，另一场“自杀流行病”的讨论充斥了当时期刊学术性著作和小说。^[11]虽然自杀在 19 世纪的一些领域被大量地讨论和介绍，但是在新的背景下，一些概念已经包含了其他寓意，而另外一些概念，则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

本书所覆盖的时期，分成阶段，组成了一个多少有些连贯的文化时期——“19 世纪”。在几种情况下（最重要在第 3 章、第 5 章），我概要地回顾了 20 世纪有关自杀的讨论，与其说是展示某些主题在下一个世纪如何发展，不如说是通过提供精选的未来的参照点以反思 19 世纪的材料。

本书是以 19 世纪 30 至 60 年代西欧科学领域中一场自杀讨论的调查开篇的（第一章）。因为那时在西欧，科学把自杀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人类行为时被作为实验案例的自杀调查，在 19 世纪人类行为科学的形成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所研究处理的事情远比自杀解释广泛得多，它集中于客体——即人及其行为——是如何由抽象的道德领域转入科学的范畴，从医学领域转入社会科学的范畴。

继而转向俄国（第二章），我就自杀在俄国国民中，在宗教法规及大众信仰中的地位给予了简要的陈述（从 19 世纪中叶至末期），探讨了俄国对西方自杀思想的剽窃，并调查了 19 世纪在俄国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然后，我转而考察了 19 世纪 60 至 80 年代间的期刊出版物（第三

章)，通过对有关具体自杀案例的摘要报道、“厚杂志”长篇累牍的一般问题的讨论，探究自杀这一主题。“厚杂志”将纯文学、文学评论、科普、时事评论及社会问题讨论结合起来在其所有专栏探讨自杀问题。由于武装了这样一些机构，报刊便成了科学、政治及文学的媒介，并且斡旋于官方与大众之间。

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试图提供自杀的解释，那么这话题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我分析了（第四章）自杀者遗留下来的记录——书信、便条和日记——并且展示了他人对这些文字材料的解读。

在 19 世纪（特别是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有望解答那些宗教、社会学或自然科学权威解答不了的问题。

此外，作家们特别渴望了解人的行为动机而不只是主体本身。撰写过多篇有关自杀文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科学家的身份深入研究过隐藏在人灵魂深处的某些领域；以哲学家的身份对个体的经历进行了抽象概括；以牧师的身份，教导人们相信，上帝仍在他们的生命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尝试做新闻记者。在《作家日记》中，这是他唯一一本由他本人独自撰写和发行的杂志，他对新闻报刊报道的自杀案例进行了评论。这部《日记》是作者试图从他的书本中迈向现实生活的一种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巧与需要他的读者相遇了（也是不期而遇），因为在他们中间恰好有准备去自杀的人。我将考察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解决自杀问题时所做的诸多努力。

在与诸多解释者们打交道时，我们要正视被福柯戏剧化地表现出来的一个尼采式问题：到底是谁在说？谁在讲话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努力在本书中描述解释者与被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结尾一章，我重述了新闻记者阿尔伯特·科夫纳的个性主张，他是彼得堡《呼声报》的小品栏作家，因此，这个解释环节是完整的：对人类行为意义的推想一直都是通过各种相互关联的文化领域来探寻的，在这些文化领域中，其主体，无论是演员还是解释者，均已被稳定地嵌入其中了。

在最近的数十年间，对人类经历和行为解释的方法，也已被作为文

化的推想和测试，它们已经进步了许多，它们由几位从事不同领域工作的作者共同来进行的，但他们又是各自为阵独立进行研究（在他们中克利福德·吉茨从事文化人类学，保罗·理柯从事现象解释学，尤里·洛特曼则从事文化符号学研究）。米歇尔·福柯在他那不朽的著作中，创建了认识论的基础和人类经历历史性研究的论述——并且揭露了个人作为认知主体和客体之危险状况，从而对人们一切的努力提出了质疑。文化历史学家已经创造了启蒙经验主义的研究：死亡历史、性、犯罪、恐惧、感觉和肉体。本书借用了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一些有关的方法，并且必然地也对其有所超越。这样，我对意义本质的理解一直受到了正在研究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或许这是所有意义创建体系中最复杂的。我着重强调了经验描述的象征性作用和其作为一个有力认识工具的观点之隐喻性。我把医学、社会科学、法律和报刊杂志作为是由不同启发策略和修辞方式而形成的知识模式，并且修辞方式也是作为启发式的策略而发挥作用的。在分析由科学、报刊杂志和小说共享的论述中，我展示了它们是如何用同样的话语描述不同意思。作为昔日的一位结构学家，我很容易明白包含在主线中的结构形式。在对19世纪俄国的材料进行加工分析研究时，我借用了西方的思想——这是一个展示进行创造性改造潜能的机会。我曾除了接受过文学研究和文化历史的学习训练外，还接受过心理学的学习训练，我试图努力接管这个主题，即行动者和解释者。文学和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的研究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不是因为他的许多读者会选择相信他提供了自杀之谜的答案，而是因为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接近一个问题，即相信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调查研究者均可了解自杀的内涵。

历史调查：示范性案例

在19世纪，从苏格拉底到歌德笔下的维特，对自杀的研究总是先

